

张元济^{评传}

國學大師
叢書

趙標初題



《国学大师》你绕不开的一座高峰

国学巨匠，百年经典，新眼指路！

大师们以他们独特的艺术风格，为中国文化增添了瑰丽的色彩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张元济评传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元济评传/张荣华著. —2 版.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0. 3
(国学大师丛书)

ISBN 978—7—80579—669—7

I. 张… II. 张… III. 张元济 (1867—1959) —评传 IV. 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21181 号

书 名: 张元济评传

作 者: 张荣华

责任编辑: 钱 宏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网 址: WWW.BHZWY.COM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19 万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1—1500

定 价: 28.50 元

书 号: 978—7—80579—669—7

邮政编码: 33008 电话号码: 0791—6894736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总 序

ZONG XU

张岱年



总 序

Guo Xue Da Shi Cong Shu

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风。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

辈，……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觥，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不够深切而已。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蓟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覿，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有清一代，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太炎更自赞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太炎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美。”章氏博通华梵及西哲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岁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王静安先生早年研习西方哲学美学，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学的观点考察中国文学，独辟蹊径，达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后，专治经史，对于殷墟甲骨研究深细，发明了“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物与古代史传相互参证，达到了精确的论断，澄清了殷周史的许多问题。静安虽

以遗老自居，但治学方法却完全是近代的科学方法，因而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

陈寅恪先生博通多国的语言文字，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证，多所创获。陈氏对于思想史更有深切的睿见，他在对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论儒佛思想云：“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在吾国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实在是精辟之论，发人深思。陈氏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但是他的学术成就确实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此外，如胡适之在文化问题上倾向于“全盘西化论”，而在整理国故方面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冯友兰先生既对于中国哲学史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又于40年代所著《贞元六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融会中西的哲学体系，晚年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表现了热爱真理的哲人风度。

胡适之欣赏龚定庵的诗句：“但开风气不为师。”熊十力先生则以师道自居。熊氏戛戛独造，自成一家之言，赞扬辩证法，但不肯接受唯物论。冯友兰早年拟接续程朱之说，晚岁归依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这些大师都表现了各自的特点。这正是学术繁荣，思想活跃的表现。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有鉴于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辈出，群星灿烂，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第三次思想活跃的时代，决定编印《国学大师丛书》，以表现近代中西文明冲撞交融的繁盛景况，以表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的丰富内容，试图评述近现代著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凡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风气之先者皆可入选。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编辑部同志建议我写一篇总序，于是略述中国近现代学术的特点，提供读者参考。

1992年元月，序于北京大学



总 序

Guo Xue Da Shi Cong Shu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

CHONG XIE JIN DAI ZHU ZI CHUN QIU



《国学大师丛书》在各方面的关怀和支持下，就要陆续与海内外读者见面了。

当丛书组编伊始（1990年冬）便有不少朋友一再询问：为什么要组编这套丛书？该丛书的学术意义何在？按过去理解，“国学”是一个很窄的概念，你们对它有何新解？“国学大师”又如何划分？……作为组织编辑者，这些问题无疑是必须回答的。当然，回答可以是不完备的，但应该是明确的。现谨在此聊备一说，以就其事，兼谢诸友。

一、一种阐述：诸子百家三代说

中华学术，博大精深；中华学子，向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精神著称于世。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出现过三个广开风气、大师群起的“诸子百家时代”。

第一个诸子百家时代，出现在先秦时期。那时，中华本土文化历经两千余年的演进，已渐趋成熟，老庄、孔孟、杨墨、孙韩……卓然颖出，共同为中华学术奠定了长足发展的基脉。此后的千余年间，汉儒乖癖、佛入中土、道教蕪生，中华学术于发展中渐显杂陈。宋明时期，程朱、陆王……排汉儒之乖、融佛道之粹、倡先秦之脉、兴义理心性之学，于是，诸子百家时代再现。降及近代，西学东渐，中华学术周遭冲击，文化基脉遇空前挑战。然于险象环生之际，又一批中华学子，本其良知、素养，关注文化、世运，而攘臂前

行，以其生命践信。正所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康有为、章太炎、严复、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鲁迅、黄侃、陈寅恪、钱穆、冯友兰……他们振民族之睿智，汲异域之精华，在文、史、哲领域筚路蓝缕，于会通和合中广立范式，重开新风而成绩斐然。第三个诸子百家时代遂傲然世出！

《国学大师丛书》组编者基于此，意在整体地重现“第三个诸子百家时代”之盛况，为“第三代”中华学子作人传、立学案。丛书所选对象，皆为海内外公认的学术大师，他们对经、史、子、集博学宏通，但治学之法已有创新；他们的西学造诣令人仰止，但立术之本在我中华从而广开现代风气之先。他们各具鲜明的学术个性、独具魅力的人品文章，皆为不同学科的宗师（既为“经”师，又为人师），但无疑地，他们的思想认识和学术理论又具有其时代的共性。以往有过一些对他们进行个案或专题研究的书籍面世，但从没有对他们及其业绩进行过集中的、整体的研究和整理，尤其未把他们作为一代学术宗师的群体（作为一个“大师群”）进行研究和整理。这批学术大师多已作古，其学术时代也成过去，但他们的成就惠及当今而远未过时。甚至，他们的一些学术思想，我们至今仍未达其深度，某些理论我们竟会觉得陌生。正如第一代、第二代“诸子百家”一样，他们已是中华学术文化传统的一部分，研究他们，也就是研究中国文化本身。

对于“第三代诸子百家”及其学术成就的研究整理，我们恐怕还不能说已经充分展开。《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织编辑，是一种尝试。

二、一种观念：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

纵观历史，悉察中外，大凡学术的进步不能离开本土文化基脉。但每一代后起学子所面临的问题殊异，他们势必要或假古人以立言、或赋新思于旧事，以便建构出无愧于自己时代的学术。这正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精神在每一代学子身上的最好体现。以上“三代”百家诸子，莫不如是。《国学大师丛书》所沿用之“国学”概念，亦当“赋新思于旧事”而涵注现时代之新义。

明末清初，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颜（元）四杰继



起，矫道统，斥宋儒，首倡“回到汉代”，以表其“实学实行实用之天下”的朴实学风，有清一代，学界遂始认“汉学”为地道之国学。以今言之，此仅限“国学”于方法论，即将国学一词限于文字释义（以训诂、考据释古文献之义）之范畴。

《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编者以为，所谓国学就其内容而言，系指近代中学与西学接触后之中国学术，此其一；其次，既是中国学术便只限于中国学子所为；再次，既是中国学子所为之中国学术，其方式方法就不仅仅限于文字（考据）释义，义理（哲学）释义便也是题中应有之义。综合起来，今之所谓国学，起码应拓宽为：近代中国学子用考据和义理之法研究中国古代文献之学术。这些文献，按清代《四库全书总目》的划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经部为经学（即“六经”、实只五经）及文字训诂学；史部为史志及地理志；子部为诸子及兵、医、农、历算、技艺、小说以及佛、道典籍；集部为诗、文。由此视之，所谓“国学家”当是通才。而经史子集会通和合、造诣精深者，则可称为大师，即“国学大师”。

但是，以上所述仍嫌遗漏太多，而且与近现代学术文化史实不相吻合。国学，既是“与西学接触后的中国学术”，那么，这国学在内涵上就不可能、也不必限于纯之又纯的中国本土文化范围。尤其在学术思想、学术理论的建构方式上，第三代百家诸子中那些学贯中西的大师们，事实上都借用了西学，特别是逻辑分析和推理，以及与考据学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实证方法，还有实验方法、历史方法，乃至考古手段……而这些学术巨子和合中西之目的，又多半是“赋新思于旧事”，旨在建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创立新的学术范式。正是他们，完成了中国学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我们今天使用语言的方式、思考问题的方式……乃得之于斯！如果在我们的“国学观念”中，将他们及其学术业绩排除在外，那将是不可理喻的。

至此，《国学大师丛书》之“国学”概念，实指：近代以降中国学术的总称。“国学大师”乃“近现代中国有学问的大宗师”之意。因之，以训诂考据为特征的“汉学”，固为国学，以探究义理心性为特征的“宋学”及兼擅汉宋者，亦为国学（前者如康有为、章太炎、刘

师培、黄侃，后者如陈寅恪、马一浮、柳诒徵)；而以中学(包括经史子集)为依傍、以西学为镜鉴，旨在会通和合建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者(如梁启超、王国维、胡适、熊十力、冯友兰、钱穆等)，当为更具时代特色之国学。我们生活在九十年代，当取“一代人有一代之学术”(国学)的观念。

《国学大师丛书》由是得之，故其“作人传、立学案”之对象的选择标准便相对宽泛。凡所学宏通中西而立术之本在我中华，并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现代风气之先以及首创新型范式者皆在入选之列。所幸，此举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当今学界老前辈的同情和支持。

三、一个命题：历史不会跨过我们这一代

中西文明大潮的冲撞与交融，在今天仍是巨大的历史课题。如今，我们这一代学人业已开始自己的学术历程，经过80年代的改革开放和规模空前的学术文化积累(其表征为：各式样的丛书大量问世，以及纷至沓来名目繁多的学术热点的出现)，应当说，我们这代学人无论就学术视野、抑或就学术环境而言，都是前辈学子所无法企及的。但平心而论，我们的学术功底尚远不足以承担时代所赋予的重任。我们仍往往陷于眼花缭乱的被动选择和迫不及待的学术功利之中难以自拔，而对自己真正的学术道路则缺乏明确的认识和了悟。我们至今尚未创建出无愧于时代的学术成就。基于此，《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编者以为，我们有必要先“回到近现代”——即回到首先亲历中西文化急剧冲撞而又作出了创造性反应的第三代百家诸子那里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困惑与浮躁，我们也该着实潜下心来，去重新了解 and 领悟这一代宗师的学术生涯、为学风范和人生、心灵历程(大师们以其独特的理智灵感对自身际遇作出反应的阅历)，全面评价和把握他们的学术成就及其传承脉络。唯其贯通近代诸子，我们这代学人方能于曙色熹微之中，认清中华学术的发展道路，了悟世界文化的大趋势，从而真正找到自己的学术位置。我们应当深信，历史是不会跨过我们这一代的，90年代的学人必定会有自己的学术建树。

我们将在温情与敬意中汲取，从和合与扬弃中把握，于沉潜



与深思中奋起，去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便是组织编辑《国学大师丛书》的出版宗旨。当我们这代学人站在前辈学术巨子们肩上的时候，便可望伸开双臂去拥抱那即将到来的中华学术新时代！

钱宏（执笔）

1991年阳春节初稿

1992年立春节修定



Guo Xue Da Shi Cong Shu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



序一

姜义华



序

—

Zhang Yuan Ji Ping Zhuan

张元济以清末进士出身，历官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因参与维新变法运动而革职，从事学术活动，进而以学者身份投身商海，致力于出版事业，在近代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尊丰碑。以学者而兼出版家，一身而二任，高水准的学术素养推动了事业蓬勃发展，事业的蓬勃发展又促进了学术研究本身的升华，学术与事业都由此放出异辉，这更为二十世纪中国企业家通过提高自身的学术文化素质而推动事业的发展树立了卓越的榜样。

在对清末以来历史人物的研究中，张元济长期处在不受注意的状况，没有多少人了解他的生平经历，更谈不上对他在近代学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作出深入的研究和公允的评价。自8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思想禁锢的冲破，以及许多尘封埋没的文献资料重见天日，一些被淡忘已久的人物开始受到关注，张元济就是其中一例。此中冷暖消息，多少透露出时代风云的变化



和研究视角的转变。继张元济的日记、书札、诗文等面世后，陆续出现了四种传记。王绍曾《近代出版家张元济》（商务印书馆1984年）侧重于论述张元济整理古籍的成果，汪家熔《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收入“走向未来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新西兰叶宋曼璜《从翰林到出版家》（香港1992年中译本）、吴方《仁智的山水》（收入“世纪回眸丛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都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比较完整地叙述了传主的一生经历。而《张元济年谱》（张树年主编，商务印书馆1991年）的出版，使人们对张氏一生各个阶段的活动有了更加具体充实的了解。

鉴于上述情形，这本《张元济评传》未再重复叙事式的写法，而是依时间顺序选择传主生平思想和实践中的若干问题进行评析，试图通过几个不同侧面的描写来凸现传主的独特贡献和精神风貌。全书基本上由一些专题述评所构成，虽然在生平史实记述上并不完备，时常是疏可走马，一些章节在叙述中因兼顾首尾而出现时间上的交叉性，但文中具体论述的不少内容已将张元济研究推进了一步，并对一些为先前研究者忽略的问题作了探索。如书中对维新运动张氏兴办新式教育时西学认识程度的分析，对世纪交替前后张氏思想宗旨立场变化的探讨，以及对他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办《外交报》的意义和社会影响的评估，对他在清末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有关语言文字改良的言行所作的论述等，都是现已出版的诸种传记中未及展开的。

近代诞生的新式出版事业对中国的文化转型及社会变迁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和作用，已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认识到，但至今这还是一个尚待开拓的研究领域；作为近代出版文化主要奠基人的张元济，在这方面发挥的潜在影响之大，也依然未得到准确充分的估计。书中第四章在这方面作了一定的努力。作者未拘囿于罗列出版实绩，将商务印书馆的前三十年作为一个研究单元，结合对当时城市发展、民主思潮、出版限制状况等五个方面的背景考察，分析张元济在经营文化企业方面所贯彻





的各项宗旨及其取得的成就，从中探讨张氏对政治、文化、社会之间关系的认识，并由此论证他以私营资本企业为依托，在中国开拓“公共领域”的追求倾向。关于近代中国是否产生过这样的“公共领域”，目前学术界尚存在较多分歧，作者的观点能否成立，当然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检讨，但书中所作的探索，对推进张元济研究和近代出版事业研究无疑是有益的。对于张元济在整理古籍方面取得的杰出成就，特别是《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这三大编纂，研究者多从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角度作贯通论述；这本评传则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分别考察，认为它们反映了张元济三种不同的追求境界；作者援引一系列资料对此进行认真的论证，令人信服，读来并无勉强之嫌。

荣华同志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和近百年学术史教学与研究多年，搜集资料颇为勤勉，钻研资料精细深入，常常发他人所未发；尤为突出的是他善于思考，在理论思维方面有坚实的基础，因此在历史深层次的发掘方面有所建树。这部传记也表现了他的这些长处，相信他会奉献给社会更多好学深思的研究成果。

1995年5月于复旦



序二

张树年

张元济评传
Zhang Yuan Ji Ping Zhuan

先父张元济（菊生）先生生于晚清国势衰颓，外侮不断的年代。青少年时期受过严格的儒家传统教育，1892年授翰林院庶常馆庶吉士。在京任职期间，主张废除科举，创办通艺学堂，传授科学、外文知识，参与戊戌变法活动。失败后，脱离政坛，来上海主持南洋公学译书院，进入了教育、翻译、出版事业的领域。不久应夏瑞芳之邀，入商务印书馆。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他把“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作为宗旨，从编写初小教科书入手，日复一日，孜孜不倦，与同仁一起，用三十年的时间，将商务印书馆发展成了我国最大的出版单位，为我国近现代教育事业提供了完整的教材体系，为学术界提供了宽阔的活动空间，为中西文化交流和我国学术思想的近代化作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他坚持年轻时的信念，即以提倡国民教育，启迪民智来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从而富国兴邦，并身体力行，为之奋斗终生。在此同时，他又将商务印书馆的经济、技术力量

和本人深厚的功底结合起来，把收辑、整理、校勘、影印我国古籍事业推上了新的台阶，从中获得了一系列学术成果。

先父于1959年去世。进入6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商务印书馆和他本人的历史成了一个禁区，无人敢于问津。他的名字除了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中某几部的前言提到曾参考了他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稿本）之外，在大陆的出版物上就很少出现了。直到70年代末，笼罩在我国知识界上空的阴云散去之后，张元济才成了一个研究的课题。商务印书馆率先出版了他的书札、日记和诗文集，共四种。80年代中期，几乎同时有王绍曾教授《近代出版家张元济》等三种传记问世。1987年和1992年两次“张元济学术思想讨论会”较为集中地出了一批论文，同时在上海《出版史料》等刊物上，也陆续发表过不少史料和研究文章。

最近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国学大师丛书》，为我国近现代的国学大师们立传，进而以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启迪、教育后人，立意之高，为各界称颂。出版社约请复旦大学年轻学者张荣华先生撰写《张元济评传》。荣华以一年时间，忙于教学的同时，从事写作。稿成之后，我有幸先读为快。他除了广泛收集资料，进行严密的考证和深刻的分析之外，在这本传记的写作中，还显示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集中笔墨于戊戌变法前后至本世纪30年代。这是传主一生中，事业与学术活动最为频繁的时期。这样处理突出重点，节省篇幅，观点鲜明而无拖沓之感。

二、传记内容集中于学术活动、学术思想、学术成就以及对学术界的支持和影响诸多方面。既与本丛书的大题目相吻合，也符合传主本人的主要脉络。

三、本书对以前出版的几种传记和论文中较少注意到的方面，如关于《外交报》的历史地位，传主对汉语语言、文字、语音的观点等进行了探讨和论述。作者还将他近年的研究成果之一：张元济与严复的比较研究引入本书。这几方面，都为张



元济研究增添了新的角度和层面，并达到了新的深度。

四、运用当代德国思想家丁·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对传主和商务印书馆事业作了深刻的分析。传主生活在中国从封闭的封建王朝向开放的现代化国家转变的历史大变革时期，近代资本主义和上海特定的外部条件，使他摆脱了“非官则隐”的封建士大夫为人处世的模式，走出了一条与旧式文人学士迥然不同的事业与生活的道路，进而又运用商务的实力，推动了我国学术、教育、文化的近代化进程。这一分析方法，不失为一种成功的尝试。

传记出版在即，荣华命为序言，谨写下几个片段，表示对出版社和作者的感谢。

1995年5月于沪上